

鳳凰名人

第一輯

第一任內閣總理

陸希齡

(上)

內部資料

中共鳳凰縣委黨史辦
鳳凰縣政協文史委員會 編

熊希齡

(上)

肖建生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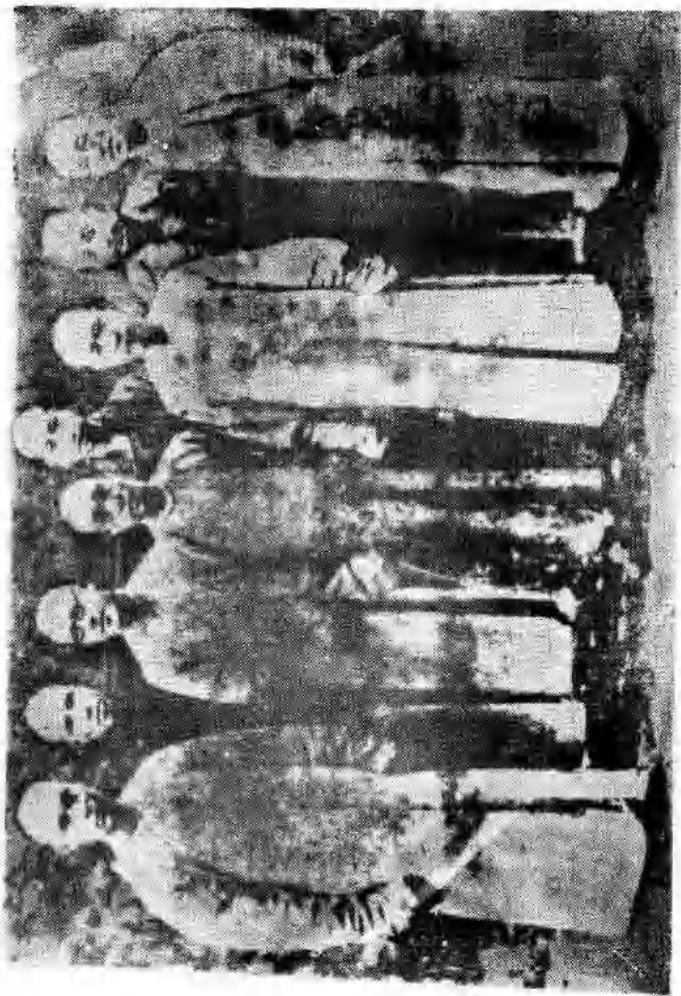
鳳凰縣政協文史委員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

(1870—1937)



湖南时务学堂总理及教习光绪戊戌春夏间合影

(自左至右: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澥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李 振 球*

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凤凰名人·第一辑·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和大家见面了，这是熊希龄先生家乡——凤凰各族人民高兴的一件事。凤凰山清水秀，地灵人杰，过去和现在人才辈出，凤凰各族人民很想，也应该知道凤凰的名人。《凤凰名人》将陆续介绍凤凰的一些名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熊希龄是中外驰名的人物，他在那种动荡不安的年代做过许多好事。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都不止一次地赞许过他，周总理曾说：“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香山慈幼院是熊希龄创办的，曾教养了数千孤苦的儿童，因为他是湖南凤凰人，所以人们尊称他为熊凤凰。”胡耀邦总书记到湘西视察时也提到熊希龄，他说，湘西是有人才的，熊希龄就是一个。凤凰县不简单，第一任内阁总理出在凤凰叫熊希龄。熊希龄有湖南神童之称，他组织的内阁被称为人才内阁。

熊希龄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爱民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少年时他怀着为振兴国民，建功立业而含辛茹苦，勤奋学习；青年时代，他想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不畏艰险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创办著名的《湘报》；后来他出任清朝政府出洋考察五大臣参赞，倡导立宪，兴学堂，办实业……，为振兴中国经济竭尽心力；辛亥革命后，他先任财政总长，后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发表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致力于改革政治、

*李振球：中共凤凰县委书记

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实业、改革教育，以实现其“谋自主以渐进于富强，”致中华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的。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迫辞职，并不遗余力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奔走呼号，策动湘西等地独立；晚年他从事贫民赈济和贫民教育事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战斗，终因劳累成疾逝世于香港。

熊希龄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是中国贫苦人民的真诚同情者和帮助者。他勤奋好学，锐意兴革，奋斗不息的气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为国为民的事迹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古人有言：“以史育人。”“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与熊希龄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熊希龄先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当然，由于熊希龄先生是处在复杂多变的时代，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表现出许多弱点，铸成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当我们评论他的功过是非时，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而不能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去苛求前人。作者和编者虽做了大量工作，本书仍难完美，但作为大家研究历史，的确还是一部来之不易丰富翔实难能可贵的内部资料。我们在阅读研究《熊希龄》时，要秉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扬弃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用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团结一致为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四化大业而奋斗。

序 言

本书写作的宗旨是：在再现历史真实复杂的面貌的过程中，对历史人物作客观地公正地评价。

研究历史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也是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条件。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态度的影响，在我国历史研究领域，存在着一种曲解历史的现象。这就是研究历史，不是首先严格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然后再进行科学的分析，而是按照预先设想的公式剪裁历史资料，使之适应某种主观的需要，在研究历史人物中，为了突出一些伟大人物，就只写他们光辉的一面，而对他们的缺点、弱点和错误，却略去不写，甚至还把一些本来不是他们创造的业绩，也硬要强加到他们头上。例如，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谭嗣同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但这个运动的兴起，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然而，有些历史著作却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他干的。这就是曲解了历史。历史的事实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最早是由王先谦等人提议的。后来，黄遵宪等人来到湖南，推进了这一工作。当然，谭嗣同也表示支持，后来，这项工作是由熊希龄主持进行的，熊希龄是时务学堂的总理，谭嗣同不仅没有参与领导工作，甚至连学堂教习都不是。另外，很多历史著作都把《湘报》说成是由谭嗣同创办的。其实，《湘报》是由熊希龄创办的，熊希龄是报社社长，主持报社的行政事务和掌握最后审稿权，而谭嗣同只是负责文字编辑和撰述工作。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有意贬低谭嗣同的历史功绩，而是为了说明

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本身，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再决定对历史人物给予什么评价。

研究历史人物，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对反面人物或是有缺点的人物，总是喜欢先给这些人戴上一顶已经定了性的大帽子，然后对别人的话语断章取义，把别人说的一无是处，甚至使用一些谩骂、挖苦、讽刺的词句，这是对历史采取了一种不严肃的态度。例如，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组织“人才内阁”的时候，曾经为袁世凯付署过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为袁世凯专制独裁帮了忙。因此，许多历史著作都把熊希龄和梁启超等人，说成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和“走狗”。说他们是“反动的官僚和政客”，说他们“为了分享北洋军阀的一杯羹”、“丑态百出”，等等。这些看法在五十年代就已形成，延续至今，似乎已成定论，但实际上是曲解了历史。熊希龄和梁启超等人，组织人才内阁，是为了实现他们改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主张，实现他们“谋自立以渐进于富强”的目的，从而使中国成为民主共和的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熊希龄付署袁世凯的命令，有他个人软弱的因素，他应该担负不可推委的责任，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一事件本身是袁世凯的阴谋，是袁世凯把“热河行宫盗宝”的冤案强加在熊希龄头上的结果。如果不尊重这一历史事实，就不能正确叙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过程，当然也就无法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地评价。本书力求避免对历史作不真实的描写，一般来说，都尽量避免先定性后叙述的作法，不从定义出发，而从事实出发，对熊希龄为国家 and 人民所作的好事，对他思想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对他的优点和缺点，对他所犯的错误（包括错误的性质及其发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都将作真实的客观的叙述和评论，努力

恢复他作为一个有救国救民的愿望而又有种种弱点的人的真实面貌。既不把他写成一个神，也不把他写成一个政治概念的化身，而力求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研究历史，还要防止把历史现象简单化，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内容，这是首先必须尊重的事实，但问题在于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公式，如果采取那种传统的一刀切的方法去研究历史，那么很明显，历史人物只能分成革命和反动两大类，这种粗暴武断的态度，是无法对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加以正确的解释的。例如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复杂局面。各种党派和政治团体纷纷出现，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为了推翻封建帝制和取得对国家的领导权，既联合又斗争，跨党现象也很普遍，由此构成十分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奇怪的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虽然很激烈，但各个政党的纲领以及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在开始时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运用不是革命便是反动的简单方法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就无法对立宪派和同盟会的功过是非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本书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力求在严格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客观地公正地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给予熊希龄这个立宪派人物以恰当的评价。

另外，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的思想感情又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并不仅仅是阶级的因素，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说明：“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

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恩格斯的话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叙述方法，本书努力按照这个方法，去叙述决定熊希龄一生思想和言行的诸种因素，如阶级的利益、国家的政局、家庭的教养、学校的教育、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地域的风俗、个人的私人交往等等。力求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再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指出他的思想愿望在他一生的大多数场合，得到的都不是预期的结果，是与他的预期的目的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以悲剧结束，努力坚持辩证的也是唯物的历史叙述方法。

为了正确评价熊希龄政治改革的活动，本书还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功过是非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客观地叙述和分析。有一点要首先加以说明：本书没有沿用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个说法。因为“改良”这个词，长期以来被加以曲解。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而且，改良和改良主义这两个名词也几乎被弄混淆了。实际上，在研究古代史的时候，用的都是“变法”、“改革”这样的名词。都是褒义的，唯独研究近代史

的时候，采用了“改良”这个词，按照通常的理解，改良就是一种革新活动，主要指的就是不采用暴力的政治改革。所以，本书决定一律采用“改革”的说法，这样意思更明确些，也更客观一些，便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公正的评价。

其次就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评价说一点看法。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九〇五年以后，资产阶级改革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是“对历史的反动”。因为熊希龄是资产阶级改革派人物之一，他强烈呼吁实行君主立宪，所以，对熊希龄的评价牵涉到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本书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样：先进行改革，改革失败之后才发生革命。清末的社会矛盾是很复杂的，革命当时在国内还只是处于秘密进行中，而改革则是全国普遍的社会舆论。资产阶级改革派要求用资本主义的立宪政体代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体，这不能说是对历史的反动，应该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上，资产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希望按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模式来改造落后的中国。都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发起过冲击，不然的话，清朝政府就不会对立宪派进行镇压和打击，辛亥革命后也就不会出现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那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资产阶级改革派中的一些人，在呼吁君主立宪遭到失败之后，辛亥革命前夕也开始倾向了革命。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要因人而论，因事而论，这样来认识问题，并不是贬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历史功绩。对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评价是有高下之别的。事实上，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政治分野也是很鲜明的。矛盾的焦点集中于是否要革命这一点上。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也很复杂，不能笼统地归结

为改革派想“维持清王朝万世一系”的专制制度。应该作具体的分析，当然，不能否定改革派的弱点。

本书认为，熊希龄是资产阶级改革派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人物。研究这样的人物，对于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正确评价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历史功过，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国家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最近，有些同志主张发扬《史记》的传统，实行文学和史学的结合，这个意见对于繁荣史学是有价值的。不过考虑到真实性的问题，本书没有采用文学描写的手法，只是尽量写得通俗一些，好读一些。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 一、军旅之家…………… (1)
- 二、沅洲求学…………… (10)
- 三、从举人到进士…………… (18)

第二章 湖南维新运动的骨干

- 一、回湖南…………… (24)
- 二、湖南实业的积极创办者…………… (30)
- 三、时务学堂总理…………… (36)
 - (一) 时务学堂创办的起因…………… (36)
 - (二) 时务学堂创办的经过…………… (39)
 - (三) 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49)
- 四、南学会成员…………… (52)
- 五、《湘报》创办人…………… (57)
- 六、在激烈的斗争中…………… (61)
 - (一) 围绕时务学堂的斗争…………… (61)
 - 斗争的起因…………… (61)
 - 斗争的经过…………… (65)
 - 《上陈中丞书》…………… (71)
 - (二) 围绕《湘报》的斗争…………… (75)

第三章 君主立宪的倡导者，造福人类的实业家

- 一、维新运动的失败及其对熊希龄的影响…………… (84)
- 二、常德讲学…………… (92)

三、一个转变.....	(97)
四、振兴实业的主张.....	(102)
五、五大臣的参赞.....	(111)
六、创办醴陵瓷业.....	(117)
七、在立宪活动中.....	(122)
(一) 秘密的活动.....	(123)
(二) 公开的活动.....	(133)
八、东北的实业建设.....	(137)
第四章 唐内阁的财政总长	
一、辛亥南归.....	(150)
二、就任财政总长.....	(158)
三、善后借款前后.....	(161)
(一) 参与借款的背景.....	(161)
(二) 参与借款的经过.....	(164)
(三) 围绕借款的种种风波.....	(171)

第一章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1870~1894)

一、军旅之家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深夜的湖南凤凰城，十分宁静。突然，在城北一幢旧式的宅院中传出婴儿“呱呱”的哭声，哭声又尖又高，吵得四邻不安，加上暑气未退，人们干脆起来歇凉，坐在小小竹椅上闲谈，都说：“熊老爷多子多福，又添贵子了！”

这个新生的婴儿，便是日后的风云人物熊希龄。这个名字是他的祖父熊廷燮给他取的。这时候，他的父亲熊兆祥，还在沅州府游击任上，未能及时赶回。家里人欢天喜地为孩子做“三朝”。这是本地的风俗。孩子生下后三天的早晨喝喜酒。亲戚朋友们都来了，孩子被抱出来与大家见面。他满嘴乳臭，在襁褓中哇哇大哭。亲戚朋友一边喝喜酒，一边称赞孩子生得脸宽额阔，将来必定能继承父业，当上军官。孩子的母亲吴氏，一位贤慧结实的苗族妇女，听到亲戚们的赞扬，喜上眉梢。然而这些孤陋寡闻的亲戚朋友，谁也没有猜到这孩子的前程。他们都断言孩子将来福大无比，却没有想到这孩子的一生竟是悲剧的命运，生活常常与人们的愿望恰恰相反。

熊希龄的家庭并非书香门第，也非官宦世家。原本却是地地道道的穷苦农民。在他祖父以前，他家世居风水打田

乡燕子岩村。这儿是一个偏僻山沟，奇峰怪石之下零零落地散布着十几幢茅房，丛深的树林里飘出几柱炊烟。这儿离凤凰县城还有好几十里，那儿还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终年雾气沉沉。夜里野兽的嚎叫使人毛骨悚然。生产条件极其恶劣，山脚下一条绿得发青的小溪，永远是那么悄悄地流过，却无法灌溉挂在陡峭山峦上的那一丘丘巴掌大的旱田。山民们一年没有半年的粮食，还得背驮粮食去城里向官府交赋交税，所剩无几，只得手持梭镖大刀，进到密林荒野去与野兽搏斗。冬天白雪皑皑，饥饿的乌鸦在结冰的树枝上“哇哇”乱叫。其实，山民们的生活比乌鸦还苦。熊希龄的先人就在这个环境里与命运争斗，繁衍生息。贫瘠的山区造就了山民们勤劳朴实，善良真诚，正直憨厚的品性，同时也有愚昧和落后的一面。他们这些优点和缺点凑到一起，便形成了山里人的性格。熊希龄是这群山民的后裔，他的血管里流着山民的血液，毫无疑问，山里人的性格对他一生的活动是有巨大影响的。有什么办法呢？山里的土壤、空气和水分只宜这样的人生存，人不能脱离环境而超然存在，因而熊希龄一生的性格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还是得首先说明这一点，这对理解熊希龄的一生是有益的。

山里人终年劳苦，仍然饥寒交迫，他们缺少起码的温饱，但决不缺少顽强和勇敢。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那英勇的精神令人感叹。但可悲的是，这种英勇顽强常常被反动统治者所利用，这是他们愚昧的表现，也是环境压迫的结果。这些山里人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熊希龄的先人当然也不例外，清朝自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以来，湘西这块苗族、土家族人民居住蛮荒之地，便由“以土官治土民”的

土司。世袭独占制度，变成由中央在各地设府州厅县，并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官管辖。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利于民族的联系和发展生产、贸易、教育和文化，以及移风易俗。例如苗汉从此通婚，固然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进步性；但在另一方面，严重的民族歧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少数民族人民简直难以存活，连乾隆皇帝都认为：“苗众转致失业，贫难无度者日多”。^①可见当时土地兼并和赋税沉重到了怎样的程度。因而反抗就势所必然。清乾嘉年间，终于暴发了吴八月、石柳邓、石三保等人领导的湘西苗民起义，起义人数达三十多万，时间达十一年之久，绵延四川、贵州、湖南三省边境一千二百多华里，最后在清朝结集七省兵力的残酷镇压和“内部分化”策略的联合逼攻下才告失败。然而，这次苗民起义的失败，却恰是熊希龄家族命运的转机。因为苗民起义后，清朝政府为巩固在湘西的统治，便采纳湖南分巡、辰沅永靖兵备道员傅鼐的建议，在湘西设屯养兵，建立了一支绿营部队。熊希龄的曾祖父便被招入伍，他的祖父熊廷燮也被招募。在镇压苗族人民反抗的作战中，立有“战功”，当上了下级军官。不久就把家从偏僻贫穷的燕子岩，迁到了当时的镇竿镇（即凤凰厅治所）北门的街上。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又承父业，加入绿营军，被调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熊兆祥在作战中也有“微功”，被提拔为沅州府的游击，驻守在那里。但他的家小仍在凤凰城中居住。在镇压苗族人民起义和太平天国的起义中，穷苦的山民被招募入伍的不在少数，他们打起仗来，就象与大自然搏斗时那样的强悍，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为谁作战、与谁作战，结果，大多数人的白骨抛掷在荒山野岭，作了反动的政治压迫的牺牲品，只有个别